

延安大学
文化素质教育
系列教材

红色经典 导论

惠雁冰 马海娟
申朝晖 侯业智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延安大学
文化素质教育
系列教材



红色经典 导论

申朝晖 惠雁冰
侯业智 马海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简介

本书是“延安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之一,也是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 2015 年专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全书内容共分为十五讲:第一讲至第三讲,介绍了“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与内涵界定,并针对近年来围绕“红色经典”持续争论的主要问题,理性评价了“红色经典”的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第四讲至第十三讲,分析了《白毛女》等十部“红色经典”代表性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第十四讲和第十五讲,阐释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发展流变及其美学呈现方式。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开设的特色公选课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相关选修课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经典导论/惠雁冰等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4-045895-4

I.①红… II.①惠… III.①革命传统教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①D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6295 号

策划编辑 孙 璐
责任校对 张小镝

责任编辑 孙 璐
责任印制 尤 静

封面设计 王 鹏

版式设计 王艳红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4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5895-00

“延安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编委会

总 策 划：薛义忠 张金锁

编 委 会 主 任：胡俊生 武忠远

编委会副主任：吕 磊 党子奇 侯业智 李荣昌

编 委 会 成 员：魏久尧 武宏志 惠雁冰

孙鸿亮 杜林渊 谭虎娃

本书

由延安大学教务处、延安大学教材与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为陕西省人文社科“青年英才计划”之阶段性成果
为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 2015 年专项项目之阶段性成果

前言：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 重新认知“红色经典”

惠雁冰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文化始终是表征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特定图标,决定了所属民族的独异性与唯一性。同时,每一种文化形态又具有自生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文化基因内在的承传与转化映照民族历史的续接和变迁,而文化元素的他借与丰富又体认着民族历史的发展与更新。对于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民族而言,经历了历史的悠久、历史的创痛与历史的新生,也深刻地体验了不断重绘的文化版图中核心价值元素的强大生命力。在文化创新的呼声日益强劲的当下,迫切需要一种发生于传统文化内部、又深度影响了当代文化进程的文化资源来梳理当代文化的历史来路,界定当代文化的核心价值,阐释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文化资源。

一、“红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

在民族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最稳定的一种文化资源。家国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和之美的文化理想,“自律慎独”的道德操守与舍生取义的人格气节,圆满阐释了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时空,也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相伴始终,尽管其间也有不同文化质素的融入与变革,但其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一直显性存在。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摇撼着传统文化的自足性,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图强兴国的社会心声,也在不断刺逼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民族性格的巨大改变。自此,传统文化中素来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转为富国强民的社会理想,传统文化中克己忠恕的道德修养转为为天下呼的勇敢践行,传统文化中内敛、含蓄、优雅的民族性格转为穷则思变的外显与刚毅。

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把中国拖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在历史性的劫难面前,以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族先行者肩负着民族大义,怀揣着民族独立自新的理想,筚路蓝缕,艰苦卓绝,不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中国,而且创构了以革命为先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以奋斗与献身为个体人生价值的,以全民族的自由、独立为社会理想的红色文化。

新中国建立后,区域性的红色文化开始向全国延伸,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崭新形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当中,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云集而入,它们在扩展民族文化视野、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当代中国文化带来了思想意识混乱与道德信仰滑坡的双重危机,红色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日益深入,民族文化承传意识的不断自觉,现代公民社会的不断完善,一度被视为现代化对立面的红色文化,再一次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资源,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与创新当中。由此可以看出,红色文化并非天外之物,而是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也是民族文化流变发展的历史性产物。

二、“红色经典”是“红色文化”的集中投射

文化的存在方式莫过于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典籍的形式呈现,以统一的理念规范个体的意志、行为与情感;另一种则是以美学的方式呈现,以艺术化的文本诉诸个体的情感力量,化育个体的精神心理,柔性地协调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共同作用于日常生活,形成一种整体性、普遍性的生存氛围。其中,尤以艺术化的呈现最能熏染人心。对于战火中形成的红色文化而言,之所以能持续主导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深刻影响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图式,与“红色经典”的感染强烈、流播深远不可分割。也就是说,“红色经典”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存在形态,成为红色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投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红色经典”以历史全景的方式,宏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抗敌御侮、建立民主政权的壮阔一幕,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的历史发展逻辑。从20世纪20年代的艰难起步,到30年代如火如荼的铁血抗争,从40年代的烽火四起,到挥鞭南下的摧枯拉朽,“红色经典”以磅礴的气势,刻绘出苦难民族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其二,“红色经典”以丰富饱满的形象,生动书写了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意志锻造、信仰建立的豪迈历程。无论是一身白衣、涉世不深的林道静,还是冲出牢笼、寻找出路的吴清华,无论是三家巷中怀揣着朴素梦想的周炳,还是渣滓洞里砥砺意志的成岗与刘思扬,“红色经典”以具有历史实证性的鲜活素材,勾勒出一代青年的成长史与情感史。

其三,“红色经典”以英雄崇拜的传统母题,精彩阐释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生与死、国与家、义与利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管是面对人伦戕害的地下交通员杨晓东,还是直面死亡的许云峰,不管是在隐忍中淡化私仇的朱老忠,还是在血雨腥风中如金刚般复生的史更新,“红色经典”以激活民族心智的美学镜像,描摹出超越单一民族意涵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英雄史与创世史。

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依然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撑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红色经典”完成了从孕育、发展到繁荣的经典化过程。尤其是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大批代表着历史厚度与文学高度的长篇小说,集中展现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在特定历史环境的推动下,这些价值元素的生成与影响,也经历了从文本到生活、从文学性到文化性、从艺术结构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转变。从此,“红色经典”就并非一般的历史叙事文本,而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也不再单纯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同时具有了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

具体而言,“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伟大宏远的理想,即满怀着重造一个“新中国”的强烈期许。二是九死不悔的信念,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面前初衷不改,壮心不已。三是舍生取义的操作,即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四是大公无私的情怀,即在取与舍的问题上,先国家后个人,先大局后家庭,先社会后情感。五是质朴简约的人格,即在行事做人的问题上不空言、不务虚,坦荡如砥,勇于实践。

尽管“红色经典”的表现内容对应着特定的历史场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红色经典”的叙事范型与价值取向也值得我们不断反思,但其核心价值元素的精神内涵无不生发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肌理,又吸纳了现代社会启动以来的新民强国的理念,也契合着我国当代民主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历史要求。故而,“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也具有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开放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价值目标方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价值环境方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三是价值操守方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创构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从国家建设的层面而言,无数革命先驱上下求索、剖肝沥胆,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这一伟大宏远的人生理想始终是“红色经典”传唱不衰的价值主调。从社会创构的层面而言,

革命志士之所以怀着执着的信念前仆后继地顽强奋斗,就是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结束人压迫人的非人道历史,追求社会的正义公平,这一美好的社会愿景是“红色经典”全程展开的价值脉络。从培育公民的层面而言,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革命英雄克制了一己之私情别绪,投身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大业,以国为家,以苦为乐,躬行不辍,严以律己,目的就是消除差别,与民同乐,这一朴素的人格与操守是“红色经典”浓墨重染的价值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依然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撑。

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理路,我们编写了这本面向在校大学生的公选课教材,希望当代大学生能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来理性认知“红色经典”,从中提取核心元素与正向价值,在此基础上感知人生况味,体味社会风雨,辨识生活真谛,领悟做人原则,继而磨炼意志,澡洗灵魂,成为重实践、有担当的崭新一代。

目 录

前言：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新认知“红色经典”（惠雁冰）

第一讲 “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与内涵界定	1
一、“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	1
二、“红色经典”的内涵界定	5
第二讲 围绕“红色经典”持续争论的几个核心问题	9
一、“红色经典”的经典性问题	9
二、“红色经典”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14
三、“红色经典”中的人性、人情问题	18
第三讲 如何评价“红色经典”	24
一、“红色经典”具有历史节点性的重要文学史价值	24
二、“红色经典”具有历史区间性的独特文学价值	26
第四讲 《白毛女》：一部被不断生发的“红色经典”	33
一、情节回望	33
二、从民间传说到文学言说：《白毛女》的创作缘起	34
三、掀起“白毛女”风暴：《白毛女》的演出与反响	35
四、“红色经典”是如何炼成的：《白毛女》的艺术演变	37
五、《白毛女》的海外传播与艺术影响	45
六、延伸阅读	47
第五讲 《新儿女英雄传》中的英雄叙事	49
一、情节回望	49
二、《新儿女英雄传》中的英雄叙事	50
三、欲说还休的《新儿女英雄传》	58
四、延伸阅读	60
第六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62
一、情节回望	62
二、创作过程	63
三、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65
四、延伸阅读	75

第七讲 民间·大众·工农兵: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77
一、创作缘起	77
二、艺术特色	78
三、《小二黑结婚》的经典化过程	82
四、延伸阅读	86
第八讲 绘制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从《红旗谱》到《荷花淀》	88
一、情节回望	88
二、创作过程	90
三、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红旗谱》与《荷花淀》	92
四、延伸阅读	101
第九讲 《青春之歌》:浮出历史地表的革命女性	104
一、情节回望	104
二、创作过程	106
三、“浮出历史地表”的革命女性	108
四、延伸阅读	119
第十讲 《烈火金刚》:革命传奇小说的经典文本	121
一、情节回望	122
二、创作过程	124
三、《烈火金刚》的“传奇色彩”	127
四、延伸阅读	130
第十一讲 《红岩》:经典化的必然与偶然	133
一、情节回望	134
二、《红岩》经典化的“必然性”	135
三、《红岩》经典化的偶然机缘	139
四、延伸阅读	142
第十二讲 放飞的“红天鹅”: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民族气派	144
一、情节回望	145
二、创作过程	147
三、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民族气派	152
四、延伸阅读	154
第十三讲 “红色经典”中的情爱叙事	156
一、柔性的边界	156
二、丰富的隐言	160
三、典型的盲区	164

四、延伸阅读	168
第十四讲 延安木刻版画的缘起与流变	170
一、延安木刻版画的两大缘起	170
二、延安木刻版画的两支源流	172
三、延安木刻版画的传播与影响简况	178
第十五讲 延安木刻版画中的红色岁月与农村想象	181
一、延安木刻版画中的红色岁月	181
二、启蒙·代言·想象:延安木刻版画中的农民想象与农村构建	188
主要参考文献	197
后记	200

第一讲 “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 与内涵界定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以来,远离民众视野十多年之久的红色经典艺术作品开始以各种形式重返舞台,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思潮迅速成为时代热点,也不断牵动着社会各界对红色经典的重新认知与深入思考。遗憾的是,在海量出现的研究文献中,有关“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似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直到赵勇教授的一篇考证文章发表^①,才将一直悬置的“红色经典”的本源性问题,摆在了所有从事相关研究者的面前。作为一本面向地方高校公选课的教材,本书的思路也就从这里展开。

一、“红色经典”的概念缘起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数据资源中,我们所能找寻到的最初的“红色经典”的字样,应该是196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一则短讯。短讯的题目叫《革命人民的经典》,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许多非洲进步青年、集体或个人,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久久盼望的《毛主席语录》。一天,东非肯尼亚的一位青年向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要一本‘闹革命的人民的经典’。他说,‘闹革命的人民的经典’就是毛主席语录。他是在一位朋友那里读过这本红皮宝书的,他发现毛主席所说的话全都是革命真理,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把《毛主席语录》叫做‘闹革命的人民的经典’,或者叫‘红色经典’。”由此看来,“红色经典”的说法最早出自非洲青年之口,具有舶来词的意味,当时这一说法明确指称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万众拥有并远播海外的《毛主席语录》,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红色经典”有很大差别。

当然,非洲青年所使用的“红色经典”一词只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作为短讯昙花一现,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毛主席语录》在国内还是沿用“红宝书”的说法。但非洲青年所提到的“红色经典”一词,还是潜在地流露出中国革

^① 赵勇:《“红色经典”词语考》,《南方周末报》2013年1月19日。2014年3月25日《法治周末》上再次刊发这篇文章。循着赵勇教授笔下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李溢成所提供的路径,笔者在1967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确认了这条有价值的线索。

命或毛泽东应该是“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能够成立的中心语汇。事实上,后来“红色经典”这个概念的正式登场,正与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红色旋风”和“毛泽东热”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奏响红色旋风前奏的是一位年轻的摇滚乐歌手崔健。1987年1月14日,他穿着一身旧军装,裤腿一高一低,手持吉他,在首都体育馆演唱了带有明显个人色彩与调侃味道的《南泥湾》,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989年2月,他又发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个人音乐专辑,电声伴奏的民歌翻唱与雄劲的现代摇滚风,将红色年代的音乐经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拉开了夹杂着青春反叛与怀旧气息的中国摇滚风潮的大幕。

1989年,“有关毛泽东的纪实作品和毛泽东著作在市场上重新走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毛泽东热”^①。《毛泽东诗词》成为畅销书,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了《毛泽东诗词欣赏》投放市场。在各大城市的歌舞厅、音乐会上,配以摇滚乐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备受青年人的喜爱,毛泽东的画像也极为普遍地挂进了汽车的驾驶室中。同年,阔别舞台多年的新歌剧《白毛女》再度上演。这样看来,“红色经典”的概念可能最初在音乐艺术中表现出来,针对的是革命年代兴起的、民众耳熟能详的红色音乐作品,并有扩展概念边界,由音乐艺术作品开始向戏剧作品逐渐过渡的迹象。

90年代初,在不断升级的“红色旋风”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革命样板戏”也抱着谨慎与试探的态度,开始陆续重返舞台。1991年1月,现代京剧《红灯记》上演。10月,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1992年6月,在征得文化部同意后,中央芭蕾舞团重排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94年10月,上海芭蕾舞团重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与此同时,红歌翻唱之势更健。1993年,《红太阳 毛主席颂歌新节奏联唱》磁带发行,带有抒情意味的《天上太阳红彤彤》《红太阳照边疆》《十送红军》《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红色戏剧作品的再度返场与红色音乐作品的不断重现,在社会上激起了更为热烈的反响,也让“红色经典”的概念命名呼之欲出。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梁南这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诗人。早在1991年,他在《诗刊》上发表了总题为《信念,我的永恒之恋》的四首诗歌。其中,在《你眼里种植春天》部分中,有这样的诗句:“那黑睫毛遮蔽的神秘瞳孔/唯有我知道/隐约着供我浏览的红色经典。”^②这是继非洲青年之后在公开出版的报刊

① 陈新峰:《时代流行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② 梁南:《信念,我的永恒之恋》,《诗刊》1991年第7期,第11页。

中第二次出现了“红色经典”的字样。从诗篇中可知,梁南这里所说的“红色经典”应该是指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在当时,梁南的这种措辞并未引起重视,也没能与当时正在流行的红色歌舞联系起来。1995年,李登贵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东方伊甸园的政治寓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三次运用了“红色经典”一词,“人们已经撤去了对哲学的抽象的恭维,现实的危机及其对昔日精神偶像的情绪化迁怒,甚至使阅览室里的哲学教员也羞怯地用小报遮住了红色经典的封面”^①。李登贵的措辞应该有一定的指认性,他这里所说的“红色经典”也与正在流行的商业化的革命歌舞关联不大,可能是指曾经影响深远的以革命叙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当然,无论是梁南,还是李登贵,他们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红色经典”的字样,只是一种对革命文艺作品的笼统泛指,尚不能称作是带有明显自觉意识与建构倾向的概念命名。但不能排除,作为文学创作者,或者是学术研究者,他们已经从90年代初中期开始以私人化的名义用“红色经典”这个称谓来代指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

1996年,革命歌舞之风长驱直入,北京舞台红色一片。8月,上海芭蕾舞团将“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搬上首都舞台,前度刘郎今又来。当时,策划公司还有些许担心,结果观众好评如潮。北京展览馆剧场的门票最高达280元一张,最低也要60元,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场景。8月30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9月8日,北京音乐厅隆重推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9月中旬,中央芭蕾舞团再次推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这一年,风行了六七年的革命歌舞正式被命名为“红色经典”。陈咏莹在《团结》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样说道:“整整一个夏天,红色经典火爆京城。事实证明,文化市场不拒绝革命文艺,红色经典仍具有艺术魅力,90年代的观众能够理解、欣赏、接受昔日的革命文艺。”^②不难看出,当时,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红色经典”的命名,其实是一种商业和媒体的合谋行为,专指商业化演出的革命歌舞,并不包含除舞台表现之外的其他革命叙事作品。

1997年可谓一个颇有意味的转折点,与前者单纯的商业性造势不同,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红色风潮开始逐步向出版界、影视剧与学术界扩展。首先要提的就是出版界对这种社会文化热点的关注。1997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推出了“红色经典”丛书,包括《林海雪原》等十部作品。管士光后来专门追忆了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这些书籍均是人文社50年代后独家出版的,不仅在当时

① 李登贵:《东方伊甸园的政治寓言》,《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第4页。

② 陈咏莹:《革命歌舞再热京城》,《团结》1996年第5期,第41页。

影响了一代人,在今天仍然拥有一批读者,已经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其地位日益凸显。但以往这些书只是单本出版,不能形成气候,而且,封面、开本、装帧均显得较为陈旧,不太符合今天读书人的口味和图书销售理念。鉴于此,我社用‘红色经典’这个名称从内容上统一这些图书,经过精心策划将这些图书重新组合,再度设计包装,一次整体推出,以形成规模效应,产生单本出版所达不到的效果。从1998年出版以来,效果甚好。”^①而且,管士光对“红色经典”能够找到“旧有资源与读者需求的结合点”颇为兴奋,在明确界定了“红色经典”的内涵之后,还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命名的归属权做了近乎肯定的结论,“‘红色经典’是指五六十年代极具有影响力的一批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数十年来魅力不减。尽管人们对‘红色经典’这种命名、这种概括存有异议,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称为‘红色经典’,而这个命名就是由我社的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起始的”^②。后来,金涛撰文也确认了这种说法,“这套丛书几乎成为后来‘红色经典’说法的滥觞”^③。从管士光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些信息,“红色经典”特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有影响力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可实际上,“红色经典”的称谓在前期已经出现,故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具有“红色经典”命名的初始性。但不能排除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推出的这套名为“红色经典”的系列丛书,为“红色经典”内涵的确立、“红色经典”形态边界的扩充,以及“红色经典”命名的权威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改编也逐步浮出地表。1997年,《青春之歌》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接着,《新儿女英雄传》与《敌后武工队》走上荧屏,初步显示出了影视剧领域对这股红色风潮的回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学界在渐具声势的红色文化现象面前,也开始跃跃欲试,不但开始接受这种带有浓郁商业文化味道的命名,而且试着对“红色经典”进行宏观的概括:“‘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④孟繁华的这番话将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言的“红色经典”的指称范围进一步扩大,可谓当代学界对“红色经典”概念的首次确认。

① 管士光:《管士光作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2~343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管士光可能记忆有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套“红色经典”丛书是1997年12月推出的。

② 管士光:《管士光作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2页。

③ 金涛:《横看成岭侧成峰——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代丛书一瞥》,《中国艺术报》2011年4月1日。

④ 孟繁华:《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方法》1997年第10期。

新世纪初期,红色影视剧改编之风更盛。2000年,中国版本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一时。2003年,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在各大电视台热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也顺势开始展播“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雷锋》《董存瑞》《永不消逝的电波》及苏联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老电影重见天日,《人民日报》称其为“心灵的旗帜”^①,从官方的角度上基本承认了“红色经典”的命名。2004年,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重返荧屏,引发了诸多争议。此外,还有《苦菜花》《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电视连续剧也在拍摄当中。面对日益强劲的红色影视剧改编热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04年4月9日紧急下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称“‘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而创作的,是文艺作品中的瑰宝,影响和鼓舞了几代人”,要求“各省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红色经典’剧目的审查把关工作,要求有关影视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篡改,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再发《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再次对“红色经典”的内涵进行阐释,认为“红色经典”是“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②,标志着官方对“红色经典”的正式确认。2004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文艺界召开评说改编“红色经典”座谈会》。2004年6月8日,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发表题为《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一文^③,表征着当代学界对“红色经典”概念的普遍接受。

自此,不论“红色经典”的概念是否准确、科学,不论“红色经典”的重现引发了多少社会争议与学术争鸣,也不论“红色经典”在影视剧改编过程中到底存在多少问题,一个既在的事实是,“红色经典”的概念开始被社会各界人士普遍沿用,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红色经典”的内涵界定

有关“红色经典”的内涵问题,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这种现象其实与“红色经典”概念的缘起过程息息相关。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在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世纪末的怀旧情绪,催生了红色文艺现象的复兴,由解构性

① 《电影频道展播红色经典,荧屏高扬“心灵的旗帜”》,《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0日。

② 吴秀明:《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③ 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6月8日。